

# NEWSLETTER

跨境争议解决 刊物

Cross-border Dispute Resolution

第 15 期    2023 年 11 月 22 日

**JT&N** 金诚同达

# CONTENT

## 目录

国内法院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域外效果思考	01
曹兴国、史强	
股东是否应为境外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浅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法律适用	04
蒋硕、李晶莲	
公文书跨国流转新模式——中国正式加入《海牙认证公约》	07
林慕娟、周雪琪	
从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看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执行	11
李岚、罗雅青、林子瑜	
制裁对于国际仲裁的影响（上）	13
Vladimir Khvalei、杜越、范瑞珑	
临时仲裁条款的效力	15
李露	

# ABSTRACT

## 摘要

### 1. 国内法院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域外效果思考

曹兴国、史强

在国内法院已经就同一事故在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情况下，相关索赔方是否可以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采取包括扣船在内的法律行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将以自己参与的一个案件为例，就该争议问题进行探讨。

### 2. 股东是否应为境外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浅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法律适用

蒋硕、李晶莲

基于商业安排、外汇管制等因素考虑，许多中国公司选择作为境内股东在境外设立子公司，但是实际业务经营仍在境内。对于此类公司，境内股东仍应依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对其境外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主营业地”。本文将通过分析司法案例，厘清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判断境外公司主营业地所参考的认定因素，并对境内公司经营提出建议。

### 3. 公文书跨国流转新模式——中国正式加入《海牙认证公约》

林慕娟、周雪琪

《海牙认证公约》（The Hague Apostille Convention，“《公约》”）是一项旨在简化公证文件跨国承认和使用流程的国际公约。2023年3月8日，我国正式加入《公约》。2023年11月7日《公约》对我国正式生效。《公约》生效后，我国将开始签发附加证明书。加贴附加证明书的公文书可在其他缔约国间通行使用，无须办理该缔约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同样地，其他缔约国签发附加证明书的公文书也可在我国通行使用，无须办理中国驻该缔约国使领馆的领事认证。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与《公约》非缔约国之间仍然使用原有的领事认证程序。

### 4. 从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看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执行

李岚、罗雅青、林子瑜

在“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的执行过程中，英国和美国法院就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是否符合《纽约公约》的商业性要求、是否应基于主权豁免不予强制执行国际投资仲裁裁决问题进行充分阐述。本文旨在说明英国和美国法院对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执行存在某些共识，即法院认可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商业性，且不认同国家豁免是能够使得投资国免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理由。

# ABSTRACT

## 摘要

### 5. 制裁对于国际仲裁的影响（上）

Vladimir Khvalei、杜越、范瑞珑

近年来因为政治经济等多重原因，国际社会使用制裁的趋势持续高涨，从 2016 年以来，美国针对我国芯片、生物技术、先进计算乃至农业和制造业出台一系列限制措施。同时自俄乌冲突以来，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几乎囊括所有领域，这使得国际仲裁领域的视野不断向制裁引发的仲裁实体和程序问题引申。当前局势下，公司、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制裁所带来的影响已经不限于制裁本身，其国际仲裁领域也要承受种种不利。本文以俄罗斯为例，就制裁对于国际仲裁的影响展开论述分为（上）（下）两篇展开论述。

### 6. 临时仲裁条款的效力

李露

相对于机构仲裁较为规范的示范条款，临时仲裁的仲裁条款往往各种各样。在域外临时仲裁效力已无争议的情况下，主要的争议焦点往往在于仲裁条款是否构成临时仲裁。近期，有两个案例值得关注。一个是 2022 年 9 月 21 日，上海浦东法院发布涉外及涉外商投资企业商事典型案例；一个是 2022 年 12 月 27 日，最高院发布的第 36 批指导性案例中第 200 号案例。



# 国内法院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域外效果思考

曹兴国、史强

## 一、基本案情

A 公司拥有的 A 轮与 B 公司拥有的 B 船在我国海域发生碰撞，该碰撞造成油污责任在内的诸多赔偿责任。后来，A 公司对 B 公司在新加坡对 B 船提起对物诉讼，并扣押了 B 船。该对物诉讼的提起时间早于在我国海事法院提起的任何诉讼。B 船在提供担保后被释放。同时，就 A、B 两船的碰撞事故，在我国海事法院还启动多个程序，包括：（1）B 船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程序，即 B 公司就 B 船的责任申请在海事法院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该基金已经设立；（2）两船间碰撞责任认定的碰撞案件；以及（3）A 轮作为漏油船就油污责任设立赔偿基金的程序。

针对 A 公司在新加坡提起的对物诉讼，B 公司向法院提出抗辩，寻求中止新加坡的诉讼，以便在我国法院进行诉讼，理由包括（1）原告已将本诉讼中的争议事项提交我国法院；（2）新加坡法院不是审理双方争议的最合适法院（most appropriate forum）。同时，B 公司寻求新加坡法院撤销船舶扣押决定，返还其提供的担保。

此外，针对 A 公司在新加坡的诉讼，B 公司还向我国海事法院申请行为保全，请求法院禁止 A 公司“在中国境内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院就涉案碰撞事故而引起的纠纷对申请人（笔者注：即 B 公司）提起任何形式的法律程序，不得对申请人（笔者注：同上）的财产行使任何扣押或者其他妨碍措施”。但我国海事法院驳回了 B 公司的申请。


## 二、核心问题

在国内法院已经就同一事故在国内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情况下，《海商法》第 214 条<sup>1</sup>的规定 是否具有域外效力，是否将限制相关利益方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采取包括扣船在内的其他法律行动？

## 三、对核心问题的分析

根据我国《海商法》第 114 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86 条<sup>2</sup>的规定，责任人要求依照本法规定限制赔偿责任的，可以在有管辖权的法院设立责任限制基金，设立基金后的法律效果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已向基金提出索赔的任何人，不得就同一索赔向基金设立人的其他财产行使任何权利；第二，基金设立人的船舶或其他财产如因某一可向基金提出的索赔而被扣押，或者基金设立人已就此提供担保，则扣押应被解除，担保应被释放。

应当认为，我国《海商法》对于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效果的规定是直接且肯定的。但同样应当注意的是，我国现有的海事诉讼程序法将设立基金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对待，




有关责任限制的实体问题，特别是责任人是否有权享受责任限制或者某一特定海事请求是否属于限制性债权等基本不在基金的设立程序中审查，而是留在海事争议实体审理程序中审查。因此，即使责任人已经设立基金，但并不代表其最终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8条规定，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后，海事请求人基于责任人依法不能援引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抗辩的海事赔偿请求，可以对责任人的财产申请保全。也就是说，对于非限制性债权或者责任人可能丧失享受责任限制资格时，海事请求人仍然可以采取申请扣船等财产保全措施。因此，B公司设立基金并不必然限制相关债权人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为获取担保而起诉，原因在于相关方的索赔是否属于限制性债权，和/或被告是否有权享受责任限制在中国诉讼程序中尚未明确。

此外，中国法下设立基金属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九章规定的程序性权利，而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条的规定，本法仅适用于中国领域内进行的海事活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或者其他中国法律均没有明确法律规定限制或排除海事请求人根据其他国家的法律在该国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因此，相关方为获得担保而在其他国家起诉也不必然受到中国法限制。我国也没有加入《1976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下称“《1976年公约》”）。所以，固然一般认为我国《海商法》第九章参考了该公约的规则，但该章所规定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并不等同于《1976年公约》下设立的基金，也不应产生适用该公约第十三条<sup>3</sup>阻却“向基金提出索赔的任何人”对设立基金人的其他财产行使其他权利。事实上，不同国家对于责任限额、责任限制丧失条件、限制性债权范围等法律规定可能不尽相同，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责任人会选择对其有利的国家设立基金，而海事请求人同样会选择对其有利的国家提出索赔。但这并不代表责任人会因此无法享受责任限制，因为无论是设立基金所在国或者受理海事请求索赔所在国，法院均会根据其加入的国际公约、国内法律以及其他有关事实来综合审查。《海商法》第275条规定，海事赔偿责任限制，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该条法律规定同样体现了该精神，即如果责任人在其他国家设立基金后，海事请求人在中国提起诉讼，就海事赔偿责任限制问题仍应适用中国法律进行判断。

#### 四、结语

由于不同国家在海事赔偿责任限额以及限制性/非限制性债权的范围上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一国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并不应当必然排除相关方再在其他国家寻求救济的权利。尤其考虑到我国并没有加入《1976年公约》（虽然一般认为我国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参考了该公约的规则），故我国《海商法》第九章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不能理解为等同于《1976年公约》下在该公约缔约国法院设立的基金，也不适用《1976年公约》第十三条对在缔约国法院设立基金后而产生的相应法律效果。因此，在我国设立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是否在国外具有与中国法下一样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



---

<sup>1</sup> 《海商法》第 214 条：责任人设立责任限制基金后，向责任人提出请求的任何人，不得对责任人的任何财产行使任何权利；已设立责任限制基金的责任人的船舶或者其他财产已经被扣押，或者基金设立人已经提交抵押物的，法院应当及时下令释放或者责令退还。

<sup>2</sup> 本条规定：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后，向基金提出请求的任何人，不得就该项索赔对设立或以其名义设立基金的人的任何其他财产，行使任何权利。

<sup>3</sup> 《1976 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第十三条 其他法律行为的禁止

1. 如果责任限制基金已按第十一条的规定设立，则已向基金提出索赔的任何 人，不得针对该项索赔而对由其设立或以其名义设立基金的人的任何其他财产，行使任何权利。

2. 责任限制基金已按第十一条规定设立之后，则以其名义设立基金之人所属 任何船舶或其财产，凡是因向基金提出索赔而已依缔约国管辖权予以扣押或扣留的 属于基金设立人名下的任何船舶或其他财产，或是由他提交的抵押品，均可由该国 法院或其主管当局下令开释或退还。而如果此项基金已在下列地点设立，则应一律 发出此种开释命令：

（1）已在事故发生港设立，而如事故发生在港外，则已在下一停靠港设立；

（2）对于人身伤亡的索赔，已在登陆港设立；

（3）对于货损，已在卸货港设立；

（4）已在执行扣押的国家设立。

3. 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则，仅在索赔人向管理责任限制基金的法院就该基金提出索赔，而且就该项索赔而言，确有基金可用，并可自由划拨时，才可适用。

## 股东是否应为境外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浅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法律适用

蒋硕、李晶莲

### 一、境内股东应依据《公司法》第 63 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六十三条规定了独资股东的债务承担问题，只要一人公司的股东无法证明其资产独立于子公司，就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对于境内的独资股东而言，无论其子公司设立在境内还是境外，都有可能据此对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 二、《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主营业地”的确定

《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因此，对于登记地在境外，而实际在境内经营的公司应当适用主营业地法，即中国法。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判断法人主营业地、经常居所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会将部分举证责任转移给境外公司及其独资股东，并且考虑多方面因素确定公司的主营业地。


#### 1. 通过营业执照和公章存放地、法定代表人常驻地、合同履行地认定主营业地，且被告未提供在境外实际经营证据

(2023)京 03 民终 4650 号案中，<sup>1</sup>债权人保定兴国公司向法院申请追加被执行人香港爱家公司之独资股东陈肖英为共同被执行人。一审法院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均认为，香港爱家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公章均存放于北京市，香港爱家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肖英常驻北京市，保定兴国公司与香港爱家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在北京市签订并履行，双方相关涉诉案件在北京市审理，且香港爱家公司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经营地在香港，因此可以认定香港爱家公司的主营业地为北京，进而可以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审理。

#### 2. 通过办公场所混同认定主营业地，且被告未提供在境外实际经营证据

(2017)粤民终 1019 号案中，<sup>2</sup>被告香港伯仕龙公司注册登记地在香港，被告赵书平原先为其独资股东，后转让全部股份。一审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均认为，赵书平在深圳伯仕龙公司办公场所以香港伯仕龙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涉案买卖合同注明香港伯仕龙公司的地址在深圳，且深圳伯仕龙公司对外悬挂香港伯仕龙公司的牌子，二者混同经营。并且，香港伯仕龙公司和赵书平并未提交香港伯仕龙公司在香港实际经营的办公场所、组织架构、工作人员、公司运营等情况的相关证据，可以认定香港伯仕龙公司未在香港实际经营，其主营业地在深圳。





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审查赵书平是否与公司人格混同。

### 3. 通过合同地址、银行账户所在地及合同履行地认定主营业地

(2020)浙 0782 民初 4715 号案中,<sup>3</sup>被告弗兰德斯投资公司的注册登记地为香港,被告何晓园为其独资股东。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认为,关于被告何晓园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问题,虽然被告弗兰德斯投资公司的注册登记地为香港,但其与原告签订的《销售合同》及《协议书》中标注的公司地址为内地,其付款账户及交货地和仓库也均在内地,据此可以认定其主营业地在内地。依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被告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情况下,被告何晓园作为被告弗兰德斯投资公司的独资股东,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综合上述案例,在主营业地的判断上,法院一方面会从程序的角度考虑,将部分举证责任转移给境外公司及其独资股东,在原告初步举证证明注册地与主营业地不一致后,要求境外公司及其独资股东举证证明注册地与主营业地一致,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举证责任的公平分配。原告一般为争议公司的外部人员,能够取得并掌握有关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证据相当有限,将部分举证责任转移有利于平衡双方的举证能力。另一方面,法院在实体层面会综合考虑业务主要开展地、合同签订履行地、银行账户所在地、业务上是否混同等多方面因素认定主营业地。

## 三、我国对海外投资的监管制度


实践中,许多中国公司选择在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设立独资子公司,除了能够在这些地区享受税务优惠、政策福利以外,这些地区出于隐私保护,对于当地公司的股东信息都不予公开,更不会记载这些公司对外投资的信息。

然而,我国对于境内公司的海外投资实施备案、核准等监管制度,因此,境内公司在海外投资仍受到国内监管。不同于开曼群岛等地,我国对于公司的境内外投资信息均有记录,并且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公开渠道检索,或经有权机关许可后查询。因此,对于此类实际在境内开展经营活动的境外子公司,更应当受我国法律约束,适用我国法律。

## 四、结论与建议

对于我国境内公司,无论其在境内还是境外设立独资子公司,在无法证明财产独立的情况下,都应当依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对其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会从程序和实体两方面考虑,在程序方面将部分举证责任转移给境外公司及其独资股东,平衡双方举证能力;在实体方面会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认定主营业地。

因此,作为我国境内公司,无论将子公司设立在境内还是境外,都应当遵守我国法律,合规经营子公司。同时,如果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发生纠纷,作为其独资股东的境内公司应当做好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准备。



---

<sup>1</sup> 香港爱家金融集团有限公司等与保定兴国市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案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京 03 民终 4650 号，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决日期：2023 年 5 月 31 日】

<sup>2</sup> CecilImportandExportTradingCo.、赵书平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7)粤民终 1019 号，审理法院：广东高级人民法院，裁决日期：2019 年 12 月 24 日】

<sup>3</sup> 江门市富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德国弗兰德斯艺术品投资有限公司、何晓园定作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 0782 民初 4715 号，审理法院：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裁决日期：2020 年 12 月 25 日】

## 公文书跨国流转新模式——中国正式加入《海牙认证公约》

林慕娟、周雪琪

### 简介

《海牙认证公约》（The Hague Apostille Convention，“《公约》”）是一项国际公约，旨在简化公证文件的跨国承认和使用流程。《公约》是国际私法领域最重要和最成功的公约之一，也是国际法律合作的重要基础。

2023年3月8日，我国正式加入《公约》。11月7日《公约》对我国生效。《公约》对我国生效后，我国将开始签发附加证明书，加贴附加证明书的公文书可在其他缔约国间通行使用，无须办理外国驻华使领馆的领事认证；其他缔约国签发附加证明书的公文书届时也可在我国通行使用，无须办理中国驻外使领馆的领事认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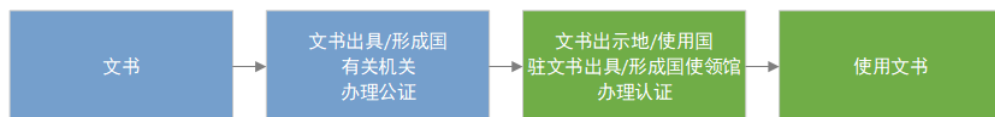
《公约》生效前，我国文件在其他国家使用，或其他国家文件在我国使用，需要办理领事认证，程序繁琐、耗时长、费用高；《公约》生效后，公证文件仅需办理一次海牙认证即可在缔约国间通行使用，程序简便、耗时短、费用低。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与《公约》非缔约国之间仍沿用原有的领事认证程序。

### 概念辨析：公证、认证、海牙认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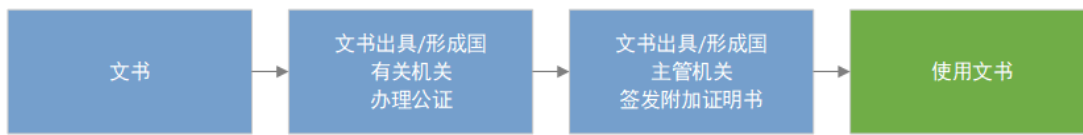
公证（Notarization），是指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sup>1</sup>。

认证（Legalization），通常指领事认证，是指一国的外交、领事机关在公证文书上证明其所载的公证机关或认证机关的最后一个签字和印章属实。认证的目的是使该文件在跨国流转时可在另一国家获得承认。



图表 1 传统模式下的外国公文书认证程序

海牙认证（Apostille），是指根据《公约》的规定，相较于传统而繁琐的认证过程，《公约》要求通过单一手续对公文书进行认证，即，缔约国由其指定机构为该国公文书签发一份“附加证明书（Apostille）”，确认公文书上其主管部门所作签字、盖章的真实性后，该公文书便可以在另一缔约国内使用<sup>2</sup>。这一过程无需公文书使用地的缔约国相关部门的介入。这一简化框架为公文书的跨国流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图表 2 《公约》框架下的简化程序

## 《海牙认证公约》、附加证明书、主管机关

《公约》全名《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Abolishing the Requirement of Legalisation for Foreign Public Documents)<sup>3</sup>，旨在废除传统认证程序，简化公文书跨国流转程序，以更便捷的证明方式取代传统领事认证，促进国际经贸和人员往来便利。截至 2023 年 10 月 9 日，《公约》已有 125 个缔约国<sup>4</sup>，约占全世界国家和地区总数的五分之三。

《公约》的核心内容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使领馆领事认证环节，代之以公文书出具/形成国主管机关签发的“附加证明书”，用于认证验证文书上的印鉴、签名的真实性。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与《公约》非缔约国之间仍沿用传统领事认证程序。

《公约》第一条第 1 款规定，本公约适用于在一缔约国领土内制作，且需要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出示的公文书。但《公约》并没有明确定义“公文书”，仅进行了举例：

适用	（一）与一国法院或法庭相关的机关或官员出具的文书，包括由检察官、法院书记员或司法执行员（“执达员”）出具的文书； （二）行政文书； （三）公证文书； （四）对以私人身份签署的文件的官方证明，如对文件的登记或在特定日期存在的事实进行记录的官方证明，以及对签名的官方和公证证明。
不适用	（一）外交或领事人员制作的文书； （二）直接处理商业或海关运作的行政文书。

**附加证明书**，是一种验证证书，由公文书出具/形成国所指定的主管机关签发。如下图所示，《公约》要求附加证明书具有 10 项要素，前 4 项为公文书相关信息，后 6 项为主管机关相关信息<sup>5</sup>。为便利公文书在国外使用，附加证明书一般使用包括英、法文及本国语言在内的两种或三种语言的范本。公文书加贴附加证明书后，可直接送往《公约》缔约国使用，无需办理传统领事认证<sup>6</sup>。每份附加证明书都有一个公开注册的编号，公文书使用方可利用文书出具/形成国提供的核查渠道验证其真伪<sup>7</sup>。



**APOSTILLE**  
(Convention de La Haye du 5 octobre 1961)

1. Country: .....

This public document

2. has been signed by .....

3. acting in the capacity of .....

4. bears the seal/stamp of .....

Certified

5. at ..... 6. the .....

7. by .....

8. N° .....

9. Seal/stamp: ..... 10. Signature: .....

附加证明书  
(1961年10月5日海牙公约)

1. 文书出具国: .....

本公文书

2. 签署人 .....

3. 签署人身份 .....

4. 印鉴名称 .....

证明

5. 签发地 ..... 6. 签发日期 .....

7. 签发人 .....

8. 附加证明书编号 .....

9. 签发机关印鉴: ..... 10. 签名: .....

图表 2 附加证明书式样（英文范本 / 中译本）<sup>8</sup>



附加证明书  
APOSTILLE  
(1961年10月5日海牙公约)  
(Convention de La Haye du 5 octobre 1961)

1. 文书出具国:  
Country:

本公文书 This public document

2. 签署人  
has been  
signed by

3. 签署人身份  
acting in the  
capacity of

4. 印鉴名称  
bears the  
seal/stamp of

证明 Certified

5. 签发地  
at

6. 签发日期  
the

7. 签发人  
by

8. 附加证明书编号  
No

9. 签发机关印鉴:  
Seal/Stamp:

10. 签名:  
Signature:



附加证明书  
APOSTILLE  
(1961年10月5日海牙公约)  
(Convention de La Haye du 5 octobre 1961)

1. 文书出具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Countr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本公文书 This public document

2. 签署人 牟海蓉  
has been signed by Mu Hairong

3. 签署人身份 公证员  
acting in the capacity of Notary Public

4. 印鉴名称 北京市方园公证处  
bears the seal/stamp of Beijing Fangyuan Notary Public Office

证明 Certified

5. 签发地 北京  
at Beijing

6. 签发日期 2023年11月07日  
the November 7, 2023

7. 签发人 龚晴, 三等秘书 / Gong Qing, Third Secretary  
by 外交部领事司 Department of Consular Affair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8. 附加证明书编号 认字第230001234567号  
No

9. 签发机关印鉴: [Seal]

10. 签名: 龚晴

图表 3 中国签发附加证明书式样（空白 / 带印鉴与签字）<sup>9</sup>

附加证明书与领事认证书功能等同，用于证明公文书上最后一个印鉴、签名属实<sup>10</sup>。

**主管机关**，是根据《公约》约定，各缔约国均应根据其机关的官方职责所指定的、有权发布附加证明书的机关<sup>11</sup>，该机关同时应对附加证明书的登记信息进行保存与索引。各缔约国指定的主管机关情况可在海牙国际私法会议（HCCH）官网进行查询<sup>12</sup>。以英国<sup>13</sup>为例，其页面列出了英国本土及其各海外领土的主管机关，且附上了相关主管机关的官网及联系方式等内容。如需申请或查询具体缔约国的附加证明书，可以登录相关主管机关的网页进行申请<sup>14</sup>及查询<sup>15</sup>。

## 中国对《公约》的声明

中国在加入《海牙认证公约》的同时，作出了几项声明<sup>16</sup>，以确保公约的国际程序机制能够满足国内要求，具体包括：

1. 我国附加证明书主管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经外交部授权，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公文书出具附加证明书。

2. 《公约》不适用于我国不承认主权国家的缔约国。
3. 《公约》继续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主管机关为香港高等法院，澳门特别行政区主管机关为澳门法务局。
4. 第二项声明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

---

<sup>1</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条：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

<sup>2</sup> 参见《公约概要》：<https://assets.hcch.net/docs/80d0e86f-7da8-46f8-8164-df046285bcdd.pdf>。

<sup>3</sup> 公约原文地址：<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full-text/?cid=41>；  
中译本地址：<https://assets.hcch.net/docs/1de6abb9-8bf8-46d0-9fe7-f4069fc620b6.pdf>。

<sup>4</sup> 中国领事服务网-《公约》缔约国名单：[http://cs.mfa.gov.cn/zggmcf/fjzms/dygm/202310/t20231018\\_11162993.shtml](http://cs.mfa.gov.cn/zggmcf/fjzms/dygm/202310/t20231018_11162993.shtml)。  
注：1.名单截至 2023 年 10 月 9 日。

2.《公约》目前暂未对加拿大、卢旺达生效。（将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对加拿大生效，于 2024 年 6 月 5 日对卢旺达生效）。

3.印度对中国加入《公约》提出异议，《公约》在中国与印度之间不生效。

<sup>5</sup> 参见《公约概要》：<https://assets.hcch.net/docs/80d0e86f-7da8-46f8-8164-df046285bcdd.pdf>。

<sup>6</sup> 《公约》第三条：为证明签名的真实性、文书签署人签署时的身份，以及在需要时为确认文书上的印鉴属实，仅可能需要办理的手续是文书出具国主管机关签发第四条规定的附加证明书。……

<sup>7</sup> 《公约》第七条：……应任何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签发附加证明书的主管机关应核实附加证明书上的事项是否与登记册或卡片索引的记录一致。

<sup>8</sup> 英文范本见于 HCCH 官网《公约》附件：<https://assets.hcch.net/docs/52435009-993f-4a32-be4b-10af158e2480.pdf>；  
中译本见于 HCCH 官网《公约》译本：<https://assets.hcch.net/docs/1de6abb9-8bf8-46d0-9fe7-f4069fc620b6.pdf>。

<sup>9</sup> 中国领事服务网-《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简介：  
[http://cs.mfa.gov.cn/zggmcf/fjzms/qxwggwsrzyqdy/202310/t20231018\\_11162932.shtml](http://cs.mfa.gov.cn/zggmcf/fjzms/qxwggwsrzyqdy/202310/t20231018_11162932.shtml)。

<sup>10</sup> 《公约》第五条：……正确填写的附加证明书可以证明签名的真实性、文书签署人签署时的身份，以及在需要时确认文书上的印鉴属实。……

<sup>11</sup> 《公约》第六条：缔约国应根据其机关的官方职责，指定有权签发第三条第一款所指附加证明书的主管机关。

<sup>12</sup>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官网公布《公约》缔约国主管机关及联系方式，可访问  
<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authorities1/print1/?cid=41>。

<sup>13</sup> 英国《公约》主管机关：<https://www.hcch.net/en/states/authorities/details3/?aid=352>

<sup>14</sup> 以英国本土为例：<https://www.gov.uk/get-document-legalised/apply-for-legalisation>

<sup>15</sup> 以英国本土为例：<https://www.gov.uk/verify-apostille>

<sup>16</sup> HCCH 官网《公约》缔约国-中国-声明/保留/通知：<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status-table/notifications/?csid=914&disp=resdn>。

# 从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看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执行

李岚、罗雅青、林子瑜

## 一、事实背景

案件争议解决双方是中山市富诚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富诚”）和尼日利亚的奥贡州（Ogun）政府。2010年，中山富诚在奥贡州获得奥贡广东自由贸易区的开发权。中山富诚与尼日利亚奥贡州政府的子公司 OGFTZ 签订了框架协议，次年依照协议约定成立了 Zhongfu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NIG) FZE（以下简称“中富公司”）。2013年9月，中富公司与奥贡州政府签署合资协议成为自贸区永久管理人并收购了 OGFTZ 的多数股权，但奥贡州政府在 2016 年终止了与中山富诚和中富尼日利亚的协议，并将中富尼日利亚及其员工从自贸区中驱逐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奥贡州政府和当地警方对中富公司的员工进行了骚扰和威胁。尼日利亚移民局拿走了中富公司外籍员工的签证文件，致使他们无法在尼日利亚工作。此外，政府还对 OGFTZ 的两名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逮捕令。

2018年8月，在穷尽尼日利亚国内救济手段后，中山富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日利亚双边投资协定》（“投资协定”）向尼日利亚提起了投资仲裁。仲裁庭由前英国最高法院前院长纽伯格勋爵（Lord Neuberger）担任首席仲裁员。仲裁庭于 2021 年 3 月 21 日作出最终裁决，认定尼日利亚违反了投资条约项下的义务，需要向中山富诚赔偿约 7000 万美元。2021 年和 2022 年初，中山富诚分别向英国和美国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

## 二、争议焦点


申请执行案件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1）裁决是否符合《纽约公约》的商业性要求？以及（2）是否可以以主权豁免为由请求外国法院不予强制执行国际投资仲裁裁决？

### （一）裁决是否符合《纽约公约》的商业性要求？

尼日利亚试图将双方的合作性质定义为非商业关系，认为中尼 BIT “本质上是主权协定”，不能构成私人投资者与两国之间商业关系的基础。并且从中山富诚最初在尼日利亚国内的诉讼中能够洞悉其承认了与尼日利亚的关系不具有商业性质。尼日利亚即使违反了中尼 BIT，但其并不涉及是商业合作协议，因此不适用《纽约公约》。法院认为在尼日利亚的论点逻辑下，任何根据主权国家违反国际公法条约而作出的仲裁裁决都是“非商业性的”，而且不在《纽约公约》的范围内。美国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已经确认了多个主权国家违反条约而非合同义务的仲裁裁决，而尼日利亚这种“新观点”似乎与多数仲裁裁决的观点相矛盾。

尼日利亚试图参考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案》（FSIA）中的“商业活动”例外情形，即当主权国家“以市场内私人参与者的方式行事时才被认为参与商业活动”来支持其论点，但被法院驳回了该商业保留观点，因为“国会在批准和实施《纽约公约》时，并未将外国主权





豁免的限制性理论编纂成发法律”。相反，因为《纽约公约》的“目的是‘鼓励在国际合同中承认和执行商事仲裁协议’……在国际仲裁中，‘商事’是指与商业有关的事项。”毫无疑问，中山富诚在尼日利亚投资数百万美元开发、管理和运营自贸区都属于商业活动。法院认为法律关系必须从合同的商业关系中产生，而本案的仲裁标的与商业有着明显的联系，因此美国法院最终确认仲裁裁决符合《纽约公约》的商业性要求并驳回尼日利亚的该项动议。

## （二）是否可以以主权豁免为由请求外国法院不予强制执行国际投资仲裁裁决？

尼日利亚在英国和美国法院均提出了该项动议。在美国法院下，尼日利亚为了保护其在美国的资产不被执行，以《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12(b)(1)-(2)条，以《外国主权豁免法案》、《美国法典》第 28 卷第 1602 节下各种未豁免的主权豁免为由，向法院申请驳回中山富诚因缺乏标的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而提出的诉求。

判决指出“若要根据仲裁例外获得管辖权，仲裁协议、仲裁裁决和管辖裁决的条约的存在都是必须确定的管辖事实。中山富诚已经满足了仲裁例外的三项要求。与此同时，尼日利亚未能证明该仲裁裁决不属于《纽约公约》的管辖范围，原因如上一个争议焦点所述。”因此，法院认为本案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的仲裁例外情形并剥夺了尼日利亚的主权豁免，确立了法院对本案的财产标的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

在英国，案件主要围绕“是否可以根据 Denton Rule 以国家豁免为由，允许尼日利亚延迟对仲裁执行令作出答复”展开。英国法院在 *Denton v. TH White* 案中确立了 *Denton Rule* 来判定案件是否需要违规方进行宽大处理并延迟诉讼程序。法院为此提出了三个阶段方法来决定：（1）确定违规的严重性；（2）考虑违规的原因；（3）考虑所有情况，包括考虑违规对整个法律程序的影响，以及违规方是否尽快提出了宽大处理的申请。尼日利亚认为法院必须根据《1978 年国家豁免法》第 1(2)条的规定，即使在国家没有出庭的情况下，法院也必须主动确定国家豁免权。法院必须就国家豁免权做出裁定，因此 *Denton Rule* 并不适用，法院应安排听证会以裁定国家豁免权。英国高等法院认为“证据确凿且不存在豁免的情况”，并准予执行暂缓令，允许尼日利亚在 74 天内对执行裁决命令提出异议。在上诉法院中，法官认可了高等法院的观点，法官随后考虑了 *Denton Rule* 的适用。

在 *Denton Rule* 第一阶段，即违约是否重大：法官认为这些违规行为十分严重，即使违约方不一定是完全故意的，但却是有意识的。在法院规定的程序时间表内，尼日利亚除了在内部转发裁决书外，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即使在 74 天期限到期后，也没有明显的紧迫性。上诉法院随即指出尼日利亚有机会对高等法院的调查结果提出质疑，但却没有遵守规定的时限。*Denton Rule* 的第二阶段下，法官指出，违约需要具有充分的理由，通常指违约方无法控制的情况，但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存在这种情况。关于 *Denton Rule* 的第三阶段，考虑案件的全局甚至平衡所有因素并仔细考虑到案件的正义性，法官最终认定给予尼日利亚救济是不公正的。“尼日利亚在整个过程中对遵守情况表现出完全漠不关心，从而拖延了法院的程序。”

英国法院认为，首先，尼日利亚在程序上的迟延不符合国家豁免；其次，尼日利亚在程序上的迟延亦不符合 *Denton Rule* 的三个要求；于是驳回了尼日利亚对执行仲裁裁决的异议。



## 制裁对于国际仲裁的影响（上）

Vladimir Khvalei、杜越、范瑞琰

近年来因政治原因，越来越多的公司、国家或地区面临制裁的问题。以俄罗斯为例，2020年6月19日《卢戈沃伊法》(Lugovoy Law)在俄罗斯生效。根据该法的规定，俄罗斯国家法院可以不顾任何现有的仲裁和调解协议，对被列入受制裁公司和个人名单的俄罗斯当事方的案件进行实质审查。

事实上，一方当事人在国际、区域或国家受到制裁（"SDN"）时是否可以被认为属于《纽约公约》第二条第(三)款中仲裁协议“无法履行(inoperative or incapable of being performed)”，并据此认为仲裁协议不存在而要求进行诉讼是主要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以下问题也值得注意：

### 一、聘用代理人

虽然表面上，聘用代理人不受影响，例如：（1）根据欧盟第 269/2014 号条例第 4 条的规定，“专门用于支付与提供法律服务有关的合理专业费用或报销所产生的费用的资金”可以使被制裁实体的资金免于被冻结。（2）在美国，外国资产管制处的一般许可覆盖了在诉讼中为受制裁方提供法律代理的情况，而无需特别许可。

但是，从欧盟来看，即使欧盟法规并未禁止将冻结资金用于支付法律服务费用，但银行通常会因为存在风险而拒绝支付或者延迟支付此类款项。同时，代理受制裁人员也需要律师事务所所需获得外国资产管制处等监管机构的许可，而这个程序耗时很长，但结果却不一定尽如人意。而在仲裁程序中时间尤为关键，因此律所倾向于根本不与受制裁方合作。除律所不愿代理外，受制裁方往往也不倾向于选择律所。律所为了获得外国资产管制处的许可，需向监管机构披露敏感的客户信息，这些信息往往会带来监管机构的二级制裁。

从美国看，上述的一般许可不适用于国际仲裁。在“United Media Hldgs., NV 诉 Forbes Media LLC”案中，原告试图撤销仲裁裁决，他们认为其因受制裁而难以聘请美国律师为其代理，尽管美国法院驳回了该请求，但在俄罗斯的“Tsargrad Media 诉谷歌”案中，原告声称其因受到制裁而无法在美国和英国聘请合格的律师代表，从而影响到了案件的处理，俄罗斯初审法院批准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 二、聘请法律及事实专家证人

上述关于聘请法律顾问的内容同样适用于聘请专家。在 2021 年版 GAR 中列出的所有 26 家专家公司都在美国、欧盟国家或英国设有办事处，因此这些专家必须履行从监管机构获得必要许可的程序，并向监管机构披露潜在的敏感客户信息，因此受制裁方在聘请专家时也处于相对不平等的地位。

### 三、关于支付仲裁费

客观上，支付仲裁费用需要取得外国资产管制处或相关欧洲监管机构的许可。这个程序可能会耗费大量时间，且不能保证获得积极的结果。主观上，银行对于受制裁实体的支付非常慎重，从其的商业利益角度来看，仲裁费相对于其他交易来说收益不大但却风险却很高，因此其往往会拒绝或者延迟处理支付请求。

例如在 *Uralvagonzavod* 案中，申请人提出，他们无法支付 SCC 仲裁费用和开支，因为付款被银行冻结，他们无法聘请合格的法律代表，因此在仲裁中享有不平等的陈述权，尽管初审法院以没有充足证据为由驳回了这些论点。然而，在 *Power Machines* 案中，申请人向俄罗斯法院所指出的，鉴于外国银行以其被列入了制裁名单为由拒绝了其付款请求，其没有机会向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支付注册费，无法保护其被侵犯的权利，俄罗斯法院支持了这一说法。

### 四、仲裁机构合规程序

尽管欧洲传统仲裁中心的主要目的是管理国际仲裁争议，但在法律上，它们仍然是根据所在国法律组建的实体，因此所有设在欧盟国家的仲裁机构，包括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和国际商会仲裁院（ICC），都受欧盟法律管辖，需执行其内部合规程序。

在实践中，为了执行这些合规程序，仲裁机构需取得涉案各方的有关交易及其标的等额外的敏感信息，并向相关监管机构披露以获得其必要批准。然而，受制裁方在这一合规过程中可能招致进一步的制裁或监管行动。

### 五、仲裁庭的形成会受到制裁的影响

外国资产管制处要求仲裁员获得相关监管机构的许可，才能接受 SDN 作为当事方的案件的任命。由于许多仲裁员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程序，这成为了阻碍他们接受任命的障碍。

此外，受雇于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仲裁员可能会面临另一个问题，即他们各自的事务所因不愿意费力从监管机构获得许可。例如，一名来自美国的仲裁员在一起案件中辞去了国际商会仲裁员的职务，在该案中，一方当事人在裁程序开始后被列入 SDN 名单。

总之，由于监管机构和一系列合规程序的存在，SDN 在仲裁法律程序的推进过程中面临重重阻碍，甚至面临被二次制裁的风险。除了这些客观障碍阻碍其招聘代理人和专家以及获得银行贷款，作为 SDN 的这一身份受到的主观上隐性的歧视也使其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 临时仲裁条款的效力

李 露

### 一、我国《仲裁法》未认可临时仲裁的效力

现行有效的《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如果仲裁条款中选定了特定的仲裁机构，则意味着当事人已经选择了机构仲裁。因此，现行《仲裁法》并没有认可临时仲裁的效力。

### 二、认可承认域外临时仲裁条款的效力

通常认为，我国在 1986 年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未对临时仲裁做出保留，可以视为对域外临时仲裁裁决的认可。

1995 年，最高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福建省生产资料总公司与金鸽航运有限公司国际海运纠纷一案中提单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复函》中明确提出，“当事人事先在合同中约定或争议发生后约定由国外的临时仲裁机构或非常设仲裁机构仲裁的，原则上应当承认该仲裁条款的效力”。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四十五条规定，“对临时仲裁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处理。”这是首次以立法形式将域外的临时仲裁纳入我国法律体系。

### 三、临时仲裁条款的认定是实践中的主要焦点

相对于机构仲裁较为规范的示范条款，临时仲裁的仲裁条款往往各种各样。在域外临时仲裁效力已无争议的情况下，主要的争议焦点往往在于仲裁条款是否构成临时仲裁。


在这方面，有两个案例值得关注。一个是 2022 年 9 月 21 日，上海浦东法院发布涉外及涉外商投资企业商事典型案例；一个是 2022 年 12 月 27 日，最高院发布的第 36 批指导性案例中第 200 号案例。

#### 1、上海浦东法院案例

在上海浦东法院的案例中，临时仲裁及准据法条款为，“如合同发生争议，双方未在书面异议通知送达后 30 个工作日内解决争议，则应当将争议提交给瑞士苏黎世的一名仲裁员进行仲裁。双方应在对方要求的 7 个工作日内指定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任命由双方指定的两名仲裁员指定，如双方指定的两名仲裁员在任命第三名仲裁员 7 个工作日内未能达成一致，则第三名仲裁员的任命应当由苏黎世商会现任主席指定；合同的订立、有效性和履行均受瑞士法支配，并按瑞士法律进行解释。”

被告认为，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第 10 条约定如双方未能在通知送达后 30 个工作日内解决





争议，则应将争议提交给苏黎世商会仲裁，并约定了仲裁员的选任规则。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无买卖合同的合意，但仲裁条款作为争议解决条款应当独立适用。故本案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上海市浦东法院认为，当事人仅约定仲裁员的选任方法，但并未约定具体的仲裁机构和仲裁规则的，构成临时仲裁。根据我国冲突规范的指引，当事人未约定仲裁协议所适用的法律，应当适用仲裁地法律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约定仲裁地为瑞士苏黎世，应当根据瑞士法判断仲裁协议的效力。根据《瑞士联邦国际私法法典》第 179 第 2 款规定，“凡未能约定协议的或者仲裁庭各成员因其他原因未能指定或替换的，可提交至仲裁庭所在地的国家法院。当事人未规定地址的或者仅约定仲裁庭地址位于瑞士境内的，则由接受该提交的国家法院负责。”故当事人即使对仲裁庭如何组成未作约定时，仍可依照前述规定，请求由仲裁地的国家法院任命仲裁员，即瑞士联邦法律在国际仲裁中认可临时仲裁的效力。据此，案涉仲裁协议的效力合法有效，案涉纠纷并非法院的受理范围，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裁定，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后原告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原告认为仲裁协议无效，被告认为是机构仲裁，而法院在查明瑞士法之后，根据瑞士法律认定该条款的性质为临时仲裁条款。再进一步根据瑞士法律肯定其法律效力。

## 2、最高院公报案例第 200 号

第 200 号案例中，争议解决条款为，“在受瑞典法律管辖的情况下，争议应在瑞典通过快速仲裁解决。”后双方发生纠纷，一方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申请仲裁。该仲裁院于以其无管辖权为由驳回了申请。后，申请人再次就案涉《合同》在瑞典申请临时仲裁。在仲裁审查期间，临时仲裁庭及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向被申请人及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邮寄了相应材料，被申请人主张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不应适用瑞典法、反对仲裁庭管辖权。在庭审过程中，被申请人未再就管辖权问题提出异议。该临时仲裁庭遂做出仲裁裁决。申请人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上述仲裁裁决。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则是“快速仲裁”和“临时仲裁”关系问题。被申请人认为双方发生争议不应当在瑞典通过临时仲裁庭处理，而应当通过其他仲裁机构快速处理。而申请人认为，其此前已经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按照快速仲裁申请了仲裁，该申请已经被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以其无管辖权为由驳回，现其向瑞典临时仲裁庭申请仲裁符合双方的约定。

南京市中院认为，双方对在瑞典通过快速仲裁解决争端并无异议，仅对快速仲裁是否可以通过临时仲裁发生争议。快速仲裁相对于普通仲裁而言，更加高效、便捷、经济，其核心在于简化了仲裁程序、缩短了仲裁时间、降低了仲裁费用等，从而使当事人的争议以较为高效和经济的方式得到解决。而临时仲裁庭相对于常设的仲裁机构而言，也具有高效、便捷、经济的特点。具体到本案，因双方已经明示同意争议通过快速仲裁的方式解决，且案涉争议标的数额不大，该快速仲裁并未排除通过临时仲裁的方式解决。……在本案中又不能明确、具体指出由哪一家仲裁机构处理，适用何种仲裁规则，在此情形下，案涉仲裁由临时仲裁庭作出裁决，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故本院认定案涉争议通过临时仲裁庭处理，并未超出双方的约定范围。





同样的，该案的焦点也是临时仲裁条款的认定问题。虽然仲裁条款载明的是“快速仲裁”，但是法院结合本案实际情况，特别是已经被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驳回，而被申请人在临时仲裁过程中又未再就临时仲裁性质提出异议的相关事实，探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认定临时仲裁程序亦符合当事人订立仲裁条款的合意。该案反映了我国法院在融入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规则中的专业性和灵活性。特别是最高院将其作为第三十六批公报案例发布，更肯定了其示范效应，值得关注。

## 本期部分作者



曹兴国（大连）

+86 411 8442 6666-8052  
caoxingguo@jtn.com



史强（大连）

+86 411 8442 6666-8057  
shiqiang@jtn.com



蒋硕（北京）

+86 10 5706 8585  
jiangshuo@jtn.com



林慕娟（上海）

+86 21 3886 2367  
linmujuan@jtn.com



李岚（深圳）

+86 755 2348 2627  
lilan@jtn.com



杜越（上海）

+86 21-3886 2311  
duyue@jtn.com



李露（成都）

+86 28 8324 7123  
lilu@jtn.com



**JT&N** 金诚同达

[www.jtn.com](http://www.jtn.com)